

政治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再思考——《语用学学刊》之“女性、权利和媒体三者联系”专刊评介

哈尔滨工程大学 叶俊楠 吴玉杰

摘要: 2011年10月,《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第43卷以专刊的形式,从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符号学等不同角度再谈女性、权利和媒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专刊基于媒体报道的语言分析,对政治中性别歧视现象进行论证和阐释,从而对当今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地位有了一个科学客观的刻画。文章将逐一介绍专刊中的论文,并对其进行简单评价。

关键词: 政治话语性别歧视; 语言分析

作者简介: 叶俊楠,研究兴趣为语用学,电子邮箱: yejunnan@hrbeu.edu.cn 吴玉杰,研究兴趣为语用学,电子邮箱: wuyujie@hrbeu.edu.cn

1 引言

近年来女性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可以说,妇女“侵入”政坛这一趋势威胁到了传统的男性政治格局。然而,基登基尔(Gidengil)和爱瑞特(Everitt)指出在人们的传统思想中政治参与者需要具备力量、竞争和坚强等特征,这些恰恰是男性所拥有的。与之相反,女性所拥有的品质则往往是软弱、合作和善良等等,而这与政治似乎格格不入(Gidengil & Everitt, 2003: 209—232)。针对女性进入政坛这一现象,有关研究表明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从政女性要走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甚至可能断送其政治生涯。众所周知,民众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来接触并了解从政人员的。作为“喉舌”,媒体处于中间者的位置,理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实际上媒体报道方式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李斯构(Lithgow)指出媒体通常注重描写女性政府人员的穿着、容貌和家庭等方面,而把男性塑造成为有活力且充满激情的绅士(Lithgow, 2000)。从以往研究中可以看出影响女性担任要职的因素有二:传统意识形态和媒体报道方式。不难看出,传统的语言研究者对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更侧重于其表现形式或者根源所在。但是现在随着当今越来越多女性涉猎政坛,性

别歧视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当代政坛中性别歧视现象展开再研究,以确定是否还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及其程度。2011年10月,《语用学学刊》第43卷以专刊的形式再次探讨了政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让人颇觉眼前一亮。同以往语言学家的研究不同,专刊另辟蹊径,从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多种角度对性别歧视现象进行一系列的“再思考”,这对于学界再次反思性别话语具有重要启示。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辑专刊所涉及的几篇文章予以述介。

2 专刊介绍

本辑专刊总共包括五篇文章。在专刊介绍部分,特约编辑西尔维娅·嘉沃斯卡(Sylvia Jaworska)对这些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总体阐述和总结。文中作者指出专刊中的论文虽然在研究侧重点和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其共性在于以多家媒体报道为语料,通过语篇分析来解释政治权利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这些文章的研究结果与爱瑞特(Everitt, 2003)的观点相左,即尽管女性从政人员有所增加且其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性别歧视现象在媒体报道中依然存在。在接下来的五篇文章中各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论证了这一现象,使读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事实。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专刊中的五篇文章。

首先,比阿特丽斯·弗拉基奥拉(Beatrice Fracchiolla)在《礼貌在男女政治辩论中作为一种攻击策略——以塞格琳·罗亚尔和尼古拉·萨科齐的辩论为例》一文中,对男性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与女性候选人(塞格琳·罗亚尔)在电视辩论中所使用的礼貌策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政治领域中男性将礼貌言语作为一种针对女性的攻击策略,以此达到诱使民众对女性产生性别歧视的目的。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如在《语言和妇女》一书中,莱考夫(Lakoff)指出女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言且说话不够果断,归根结底来源于女性的自卑心理(Lakoff, 1975);泰伦(Tannen)认为女性语言特征来源于女性所属社会团体(Tannen, 1993)。但是本文作者从称呼语和礼貌程度两方面对话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政治领域中男性反而更为频繁地使用礼貌言语,并以此作为对女性的一种攻击策略。作者指出称呼语的使用可以暗含性别倾向,并且具有反映双方礼貌程度的功能。同时礼貌作为语言的附加功能,在辩论中会受到观众无意识的关注。正如布朗(Brown)指出礼貌是对待他人的态度,即所说所做需考虑到别人的感受(Coates, 1998)。基于上述观点,作者分析数据结果表明:与对手相比,萨科齐更倾向使用礼貌用语。在整个辩论中,萨科齐没有将重点放在证明自己具备胜任总统的能力方面,而是将礼貌用语作为一种非常微妙的攻击策略来暗示或提醒选民罗亚尔的女性身份及其在传统印象中的身份劣

势,从而凸显自己作为男性政治家的优势,进而使选民相信自己更能够胜任总统一职。作者从两个维度(词语和语篇)来分析语料论证其观点,这与塔尔波特(Talbot, 2010)的研究不谋而合。

如果说上篇文章是基于电视辩论中的口头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话,那么在《罗亚尔的公众形象》一文中,杰勒德·欧格雷迪(Gerard O'Grady, 2011)则从书面语言角度采集了两家报刊(《卫报》和《每日电讯报》)对有关罗亚尔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首先作者回顾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并表示认同麦亚贺夫(Meyerhoff, 2003)的观点,即性别思维定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建构的。如此说来,媒体作为中介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作者对爱瑞特(Everitt, 2003)的观点提出质疑,试图从两家报刊对罗亚尔的报道方式中寻找答案。作者从两方面开展分析研究:一是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将语料分为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心理过程以及言语过程。韩礼德和马蒂亚森(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认为,经验是由我们人类通过语言来构建的(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通过对英语句子的分析可以区别内在和外在经验的根本差别,即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都展现出参与者的外在经验,而心理过程侧重于参与者的心理活动(包括有意识的感知、情感、欲望和思考),言语过程则是解释外化的内在经验过程(同上,2004)。因此,上述四种过程是连接经验与思想的方式,所有的英文文本都可以通过分析来解释人们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观点和态度。基于此理论,本文作者对语料库(两家报纸在特定时间内对罗亚尔的一系列相关报道)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同时,作者还注意到报道中对罗亚尔的称呼方式体现了词语的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现象,即为“一种夸大地对物体或者意见进行描述的现象”(Fowler, 1991)。而这种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媒体对女性的态度。通过分析数据,作者发现两家报道都未将罗亚尔定位为纯粹的政治家,而是在报道中用大部分内容来突显其女性特点,如倾向描述她的外貌及作为母亲这一传统形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其政治才能。由此可见媒体报道中性别歧视现象不言而喻。

在《作为法国左派领导人,阿尔莱特·拉吉埃是否与其男性竞争对手在语言上平等?》一文中,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和皮埃尔·拉瑞依(Pierre Larrivee)提出了一个假设:法国国家出版社已形成一种男女平等的传媒模式,即性别平等模式。文中两位作者指出文本可塑造被报道者,文本指示特征和属性特征均体现被报道者的相关信息。基于此,作者从上述两个特征分析三家法国主流报刊对阿尔莱特·拉吉埃的报导。首先,指示特征分为四类:一是无标识指称,即阿尔莱特·拉吉埃;二是由职位和全称组成的指称,即阿尔莱特·拉吉埃女士;三是名,即阿尔莱特;四是姓,即拉吉埃。结果表明:指代类别出现次数按照上述顺序依次降低,这是

由于媒体报道阿尔莱特·拉吉埃时随着报道次数增加,观众对她的关注度增高,使得对她的称呼更加亲切。其次,属性特征是指在文章中描述被报道者使用不同的谓语句。语料分析表明文章通过使用不同的谓语句表达个人立场、在位时间及影响力。据此,作者得出结论:在描述阿尔莱特·拉吉埃的过程中,性别不是很重要或很突显的因素。这对于性别话语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同时,作者指出由于文章的研究对象并不担任国家要职这一事实可能影响结论,所以性别平等这一现象有待深入研究。

与本专刊中其他作者不同的是,杰迈玛·阿萨比、格瑞斯·戴尔哈和帕提恩斯·赫门沙三位作者(Jemima Asabea, Grace Diabah, Patience Afrakoma hMensa)在《在无话语权的言语中身居高位的妇女:媒体在新闻话语中对非洲从政女性的误解》一文中,将研究重心放在一位非洲国家的女总统身上,以此展现了非洲的性别歧视现象。作者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并对比两则来自国内外的报道,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相似:报道女性通常倾向于家庭、生活和着装等方面。这与弗里曼(Freeman, 1997)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均指出报道从政女性普遍倾向于传统视角。作者认为媒体在报道时表现出性别歧视倾向,而其报道方式代表作者的个人想法进而体现社会文化背景及意识形态。通过比较两份报刊,作者认为在国外报道中性别歧视现象更加突出。基于以上研究,作者得出结论:在媒体报道中性别歧视现象根深蒂固。在本次专辑中,本篇论文与《罗亚尔的公众形象》放在一起,可谓珠联璧合。二者均关注事件动态发展在新闻话语中如何得以映射。文中作者从语篇或者词语两种角度来体现报道者的意图,但是由于所选文章兼有评论部分和纪实部分,所以很难控制其风格。因此,文体风格这一变量的控制研究值得引起后续研究的注意。此外,如果能够结合定量研究,比较两份报纸的报道程度差异,可能会更具说服力。

如果说上述四篇文章从共时的角度展开分析的话,那么科琳·考特(Colleen Cotter)将研究视点投向媒体行业并予以历时关注。在《在第四领域中妇女的地位:声音、文本和话题的限制》一文中,作者关注女编辑的地位及其影响并指出从宏观角度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语篇输出(包含文章主人公、相关人物以及作者的弦外之音)、社会语用规范和对社会群体的价值(Cotter, 2011)。上述三方面可以从文章标题和署名两个微观视角予以研究。其一,题目的选择往往受到作者性别的影响;其二,标题署名代表行文作者,具有非指称价值(nonreferential index value)。基于上述理论依据,作者对从1959年到2009年每隔五年《纽约时报》四月份的文章进行分析。首先,作者指出当时媒体行业对待女性的态度,然后,作者对所选文章的标题进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章标题与女性作者性别之间的某种关联逐渐改变。文章标题更加客观并且不倾向女性化,这种关联表现从显而易见到不易察觉体现出不

连续变化的特征。同时报刊的类别重新组合,以致读者无法从文章类别辨识作者性别。最后,通过署名的男女比例,作者发现在目录上女性作者署名数量不是一直保持增长,而仍由男性占主导。尽管所选语料有限,但是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妇女职业类别有所增加,但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仍有相当一部分归男性掌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文章、读者,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受到社会文化及文章价值的影响,读者通过作者性别和文章的适用范围做出喜好判断。

3 简评

女性主义共经历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合理地位为主题;第二次浪潮则以终止政治和经济上的性别歧视为旨归;第三次浪潮将女性主义运动推到更高层次,开始关注语言行为和性别话语的表征问题。本专辑可以看作是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回应,也可以看作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前沿演进。具体来说,本专辑的几篇文章着重回答了“女性主义”浪潮两大核心问题(第一,女性在现存语言系统中是怎样得到表征的?第二,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的语言行为如何不同?)中的第一个。

在本辑专刊中五篇文章的结论表明政治领域中性别歧视现象有不同的表征方式,这远非以往研究所能全部阐释,而这与传统语用学并没有将性别和语言使用的关系问题纳入其研究范围不无关联。本专辑的五篇文章一改传统女性主义将性别做二元划分或分析男女两性分别具有何种特征的做法,将性别界定为一种“行为”(doing),从而揭示性别的动态建构过程(Eckert, 1992)。当性别被看作为一种动态过程时,特定语言形式的使用就变成了个体建构自身阳刚或阴柔的问题。因此,性别已不再是先于交际而存在且可以决定语言使用的某种属性,而是因境而异的动态建构媒介。当性别印象的建构权不再存在于女性政治参与者手里,而是存在于“喉舌”媒体手中时,这一点显得尤为如此。从这五篇文章可以看出:女性政治人员竭尽全力试图改变女性的“刻板”现象,然而媒体报道和观众始终倾向于认为政治领域属于男性。由此可见,语言选择不是纯粹自发性的,不能独立于物质和社会条件的辖制之外,相应地,性别身份的建构绝非“单向建构”所能驾驭。

专刊中的研究者以政治领域为大背景研究性别歧视现象。首先,女性政治话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涉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其话语特点已经有所改变,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更多地使用男性话语意图使观众认为女性具备男性在日常工作以及实施重大决策上的能力,但是媒体报道和观众的抉择取决于对于女性的传统意识,较少受到女性话语的影响。这是一种典型的“男

女应该在不同的生活领域行使各自的功能”的“男女有别”观点，其哲学基础原型可以回溯到卢梭的“内在张力观”。但问题的关键是当社会群体中女性政治人员遭遇性别建构与结构的尴尬时——在本专辑中表现为针对女性政治人员的性别歧视——全体社会成员又有什么收获？正如纳斯鲍姆（Nussbaum, 1995）所言，“政治权利不仅对需要的满足是重要的，它们还对需要的形式是关键。这一观念最终关系到我们作为人类成员彼此拥有的尊重”。我们不禁要问，当女性政治人员遭遇性别歧视时，男性政治人员如何解释自己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信条？

其次，研究者具体阐述了新的社会环境和女性政治话语的关系，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即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存在，但是性别歧视现象程度大小可能与政治领域核心程度有关。其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只要妇女被限定于传统上被贬低的领域，与较低的“得到的福利分配”相联系，妇女的臣属地位就不会得到充分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进步抑或人类自由平等意识进步的性别授权标准正确地集中于关注女性进入传统男性政治和行政领域是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必经之路。本专辑的五篇论文从语言这一意识形态表征维度关注这一主题就是对此的一个体现。作者们不只是从文本进行研究，而且从视频中的女性形象（现场辩论暗含身，声，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通过语言学不同的分支如功能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等进行研究，试图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传统女性话语描写上的不足，并为精准锁定当下社会在朝向这一政治进步历程行进中的历时占位。

总之，本专刊对女性主义所看重的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起到了一定深化作用，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与语用学结合的典范。实际上，女性主义为语用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语用学应充分考虑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性别身份问题，作为一种宣称旨在解释语言使用的理论，如果忽视了这一因素就经不住检验，也无法为性别和语言使用的实证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特别注意语境对性别的限制条件和特定语境中性别关系的特殊性，思考“性别和语言使用的语用学研究方法是什么、语用学能产生什么样的分析工具、语用学对于女性主义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优势”不仅仅对于正确认识女性主义思潮至关重要，同时对于推进语用学研究意义非凡。由于篇幅有限，本辑专刊仅仅涉及几个国家，尚未涉及亚洲地区。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有非常浓厚的传统观念，女性的地位比较低下。因此如果可以对亚洲地区此种现象进行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此种现象的多种表达方式，更是对于语用学界“女性主义语用学”（Christine, 2000）呼声的一种回应。

参考文献

- Anderson, J. A., *et al.* 2011. Powerful women in powerless language: Media mis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women in politics (the case of Liberia).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509—2518.
- Barnes, J. & P. Larrivee. 2011. Arlette Laguiller: Does the mainstay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far-left enjoy linguistic parity with her male counterpar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501—2508.
- Coates, J. 1998. *Language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 Cotter, C. 2011. Women's place at the Fourth Estate: Constraints on voice, text and topic.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519—2533.
- Christine, C. 2000. *Gender and Language Towards a Feminist Pragma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Eckert, M. G. 1992.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Where language, gender and power all live. In K. M. Hall & B. Moonwomon (eds.), *Locating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Berkeley Women and Language Conference*. Berkeley: Berkeley Women and Language Group, 95.
- Everitt, J. 2003. Media in the Maritimes: Do female candidates face a bias? *Atlantis* 27 (2): 90—98.
-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London: Routledge.
- Fracchiolla, B. 2011. Politeness as a strategy of attack in a gendered political debate—The Royal-Sarkozy debat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480—2488.
- Freeman, J. 1997. *Femmes Politiques: Mythes et Symboles*. Paris: L'Harmattan.
- Gidengil, E. & J. Everitt. 2003. Talking tough: Gender and reported speech in campaign news coverag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209—232.
-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London: Continuum.
-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Arnold.
- Jaworska, S. 2011. Women, power and the media: Assessing the bia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477—2479.

- Lakoff, R. 1975.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New York: Harper&Row.
- Lithgow, L. 2000. A question of relatively: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shaping the view of women in Asian political dynasties. Retrieved Mar. 5, 2011, from <http://www.hks.harvard.edu./presspol/publications/papers/working-papers/2000-13-lithgow.pdf>
- Meyerhoff, M. 2003. Claiming a place: Gender,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J. Holmes & M. Meyerhoff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302—326.
- Nussbaum, C. M. 1995. Objectification. *Philosophy&Public Affairs* 24 (4) : 249—291.
- O'Grady, G. 2011. The unfolded imaging of Segolene Royal.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489—2500.
- Talbot, M. 2010. *Language and Gend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cy Press.
- Tannen, D. 1993. *Gender and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